



## 如何理解“国家级”公祭黄帝？——兼与葛剑雄教授商榷 (2007-7-3 15:08:21)

作者：韩星

这几年我们国家每年都要在清明节举行公祭黄帝的活动，而且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对此，有些学者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如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在《南风窗》2003年第8期上发表了对于“国家级”公祭黄帝进行质疑的文章，2004年4月8日葛教授又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内容大致相同的一篇时评，并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包括“人民网”等一些网站还就此进行了网上讨论。对此，笔者觉得有必要对“国家级”祭祀黄帝进行一番正本清源的反思，以订正葛教授的误解，消除人们的疑惑。

一

葛教授首先质疑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的历史真实性，提出“到目前为止，中外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还没有能够证明，黄帝确有其人，更大的可能是后人根据对先民的传说和崇拜塑造出来的。”

事实果真如此吗？不是。在中国传统的史书上，黄帝是一位事迹特多的人物。西周时期《逸周书·尝麦篇》就记述了黄帝战蚩尤的故事。春秋时成书的《左传》和《国语》都有关于黄帝的记载，如《晋语四》中就记载了黄帝的世系。战国时魏国史官编录的《竹书纪年》也有不少关于黄帝的记述。战国人所撰的《世本》为先秦重要史籍之一，其中记载了黄帝的帝系。此外，象《周礼》、《礼记》这些经书，以及诸子书中也有各种各样的记述。到司马迁写《史记》时对关于黄帝的各种史料进行了反复研究，他还进行了广泛的实际调查，曾经到处访问了黄帝、尧、舜的遗迹，听取老人的传说，核对了书本上的材料，在丛杂的文献和调查资料的基础上爬梳剔抉，自圆其说，撰成《五帝本纪》，以黄帝为第一位古帝，比较系统地记述了其事迹。后来学者对黄帝比较可疑的事迹虽然有所辨析，但大都没有否认黄帝为历史人物的资格……近代以来，在中国史学界形成一股疑古思潮，基于中国历史“层累造成说”的观念，提出“春秋以前无史”，把包括黄帝在内的许多历史人物都极端地被否定掉了。但他们的观点并未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也还是有许多学者通过对古代文献的爬梳整理，特别是通过对不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的系统研究，把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不断地把古史研究向前推进。他们或从古代文献本身推测，或从考古学的立场估量，或以民族学的观点考察，对黄帝传说的历史都作了肯定的结论，认为我国信史应从黄帝或炎黄算起。新时期以来，史学界在肯定“疑古学派”对扫除封建思想所作的贡献的同时，也明确地指出其历史的局限，特别是对其否定炎黄及其历史时代的成为进行了澄清，更由于我国考古学的长足进步，学术界对黄帝时代及其历史、文化，对中华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葛教授作为“疑古学派”的再传总得正视两千多以来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这些记载和研究成果，不要轻率地说出“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还没有能够证明黄帝确有其人”这样的话来吧。

二

葛教授接着质问“祭黄帝是祭人，还是祭神？如果是祭神，并且是‘国家级’祭神，那与宗教有什么不同？”但他并不是要谁回答，而是径直认为“祭祀仪式，从本质上讲是对神的崇拜，是相信灵魂不死。”

这里葛教授对“祭祀”概念的内涵，对“祭祀礼仪”的演变，祭祀祖先的文化意蕴没有弄清楚，就说黄帝祭祀是宗教活动，显然也是非常武断的。“祭祀”一词最早见于春秋金文，如《邾公华钟》铭曰：“以恤其祭祀盟祀”，《徐王子钟》铭曰：“以追祭祀。”先秦一般多见单称“祭”或“祀”。《说文·示部》曰：“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祀，祭无已也，从示，已声。”后来学者考证殷墟卜辞中已有祭字，多不从示，仅从手持肉会意，当为祭字初文，本意为献祭祖先神主的祭法专名。周以至春秋金文中的祭字的施动对象也是祖先神灵，后来才逐渐引申为一切祭祀活动的统称，祭祀连用就已经是统称之义了。殷周以来，祭祀就主要分为天神、地祇、人鬼三大类。祖先祭祀属于人鬼这一类，在祭祀礼仪当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和深刻的文化意蕴。

关于祭祀祖先的文化意蕴，《礼记·郊特牲》云：“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祭祀“所以报本反始也”，《礼记·祭义》云：“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在我们先民看来，自然界给了我们衣食，祖先给了我们生命，

所以要报本答恩，报答的方式便是敬天祭祖。中国人很少相信人生命是某种神灵创造的，只是实实在在在相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母又受父母，以至先祖，这是根本决不能忘记的。祭祖是报本反始之意，不忘我们所自来，报答祖先之恩德，颂扬祖先之功德。

对祖先的礼敬是贯彻始终的，即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生事之以礼属于伦理道德范畴，丧葬和祭祀确实是有宗教性的形式，但是依存和附属于前者的。在儒家看来，人在生前孝敬父母是，即使由于不得已的原因，生前不能尽孝，死后也要通过丧葬和祭祀来表达对父母的恩情。因此，儒家十分强调祭祀的伦理作用，特别是孝。孝德与祭祖二者发生联系，且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常重要的理念与力量。中国自古以伦理立国，就集中地反映在“孝”上，这就是“先王以孝治天下”。在先秦，不仅儒家倡导“父慈子孝”，墨家亦批评当时社会“父子不慈孝”（《墨子·兼爱中》）；道家批评儒家的“仁义”，却主张“孝慈”：“绝仁去义，民复孝慈。”（《老子》十九章）秦始皇以法家学说统一天下，而后巡游各地，勒石称功，其中亦有许多宣扬孝道的文字，如《绎山刻石》即有“孝道显明”之语。我们可以说孝道观念是中国古代儒家、墨家、道家和后期法家共同倡导的思想观念。因此，祖先祭祀，简单易行，很少迷信，是教人“饮水思源”报恩崇德，让人自觉“源远流长”，有“根”，有“永生”的盘石般安定的精神，也赋予子孙知道感恩，知道自尊，知道修身与行善的安顿自己的心与维系社会秩序的广大力量。

后儒也不断地发挥祖先祭祀的文化精神，如《荀子》在《礼论》中也谈到祭祀之礼的人文内涵：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

这是说祭祀之事原本不是以鬼神信仰为核心，而是在于表达思慕之情，忠信爱敬之意，所以荀子说祭祀是“人道”，人道就是祭祀的文化意义之所在，是祭祀的本质之所在。但只有“君子”（有修养的知识分子）能够领悟这一点，一般的老百姓往往还是把祭祀当成宗教性的行为。柳宗元不信神道，但也认为祭祀、占卜可作教化百姓的手段：“夫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非国语·祀》）

现代著名哲学史家冯友兰认为中国的“丧礼祭祀是诗与艺术而非宗教。其对死者之态度是诗的，艺术的，而非宗教的。”（《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8页）“关于祭礼之理论”中，引用的也是《礼记》中《祭义》和《祭统》的文字，强调“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同上第424页）说明中国人在祭祀的时候，并不是对外在神明的崇拜，而是比较注意他们自己内心的感情。一种仪式如果主要是主体性的体验，而不是的超越客体的祈盼，当然就难称是宗教的，而主要是人文的。

人民日报网络中心强国论坛(www.qq1t.com)曾邀请中国黄帝陵基金会会长孙天义教授做客，与网友交流。在回答网友“纪念黄帝，与我们平时祭祖，与迷信的最大区别在什么地方”的疑问时，孙天义教授说：“我们纪念先祖、拜谒黄帝陵的活动和宗教信仰完全是两回事。我们把黄帝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而不是作为神来崇敬的。”这个说法是有历史依据的，我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是从黄帝写起，并没有把黄帝当作神来写，而是把他作为一位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实事，德配天地，功勋卓著，得到民众爱戴的贤明古帝来写的，因此在材料的取舍上司马迁把历来关于黄帝传说的神话色彩大大地降低了，以表达对黄帝开创中华文明历史功绩的敬重。

既然黄帝祭祀不是一种宗教活动，也就没有理由说“是违反《宪法》的”，也就谈不道“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违背科学精神”，“不利于中国信史的普及，不利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科学教育，不利于对青少年的教育，只会导致沉渣泛起，伪学流行”这样的指责也就站不住脚了。

### 三

葛教授还认为“即使黄帝真有其人，也只能是一部分汉族人和某些少数民族人的祖先。……无论如何诡辩，也绝对无法证明，黄帝可能是今天中国境内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祖先。”这是完全否认了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这个历史事实。

葛教授于1989年7月5日就在《光明日报》发表过《炎黄子孙不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同义词》，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炎黄子孙”这三个概念。“中华民族”一般是指今天中国境内以汉族为主的包括56个少数民族在内的所有民族构成的民族共同体，是与世界上其他单一民族截然不同的复合民族。“中国人民”是上面所有这些民族的人民的全称，是与统治者相对应的一个政治性概念。“炎黄子孙”是“中华儿女”的代称，是就同一历史来源而说的，表达的是一种共同的亲情，一种文化的象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血统。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炎黄时代只有若干原始部落集团，而没有我们今天所谓的民族存在，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少数民族都是西汉以后逐渐形成的。从炎黄时代到西汉数千的历史过程，由部落而部落联盟，由部落联盟而早期国家，由早期国家而大一统的政权，期间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民族交流融会。今天的汉族本身就包含着历史上周边许多民族的血统，今天我们多用“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为了进一步地团结现存的少数民族而强调多民族的共同体。所以，说炎黄是汉

族的祖先不如说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更准确和恰当。于右任《黄帝功德记》在搜集了《山海经》、《史记·匈奴传》、《国语·鲁语》、《汉书·西域传》、《晋书·载纪》、《魏书&

[第 1 页]      [[第 2 页](#)]

[[关闭窗口](#)]

版权所有：国际儒学联合会 Copyright©2003-2007